

曹道衡 俞绍初 注评

魏晋南北朝

诗选评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三秦出版社

1207.22/504

本书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项目

曹道衡 俞绍初

注译

名

家

注

评

古

典

文

学

丛

书

诗选评

魏晋南北朝

三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72098

SB051/2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晋南北朝诗选评 / 曹道衡, 俞绍初注评.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4. 7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ISBN 7-80628-813-9

I. 魏... II. ①曹...②俞... III. 古典诗歌—文学
评论—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6929 号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魏晋南北朝诗选评

曹道衡 俞绍初		注评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813-9/I·164	
定 价	18.00 元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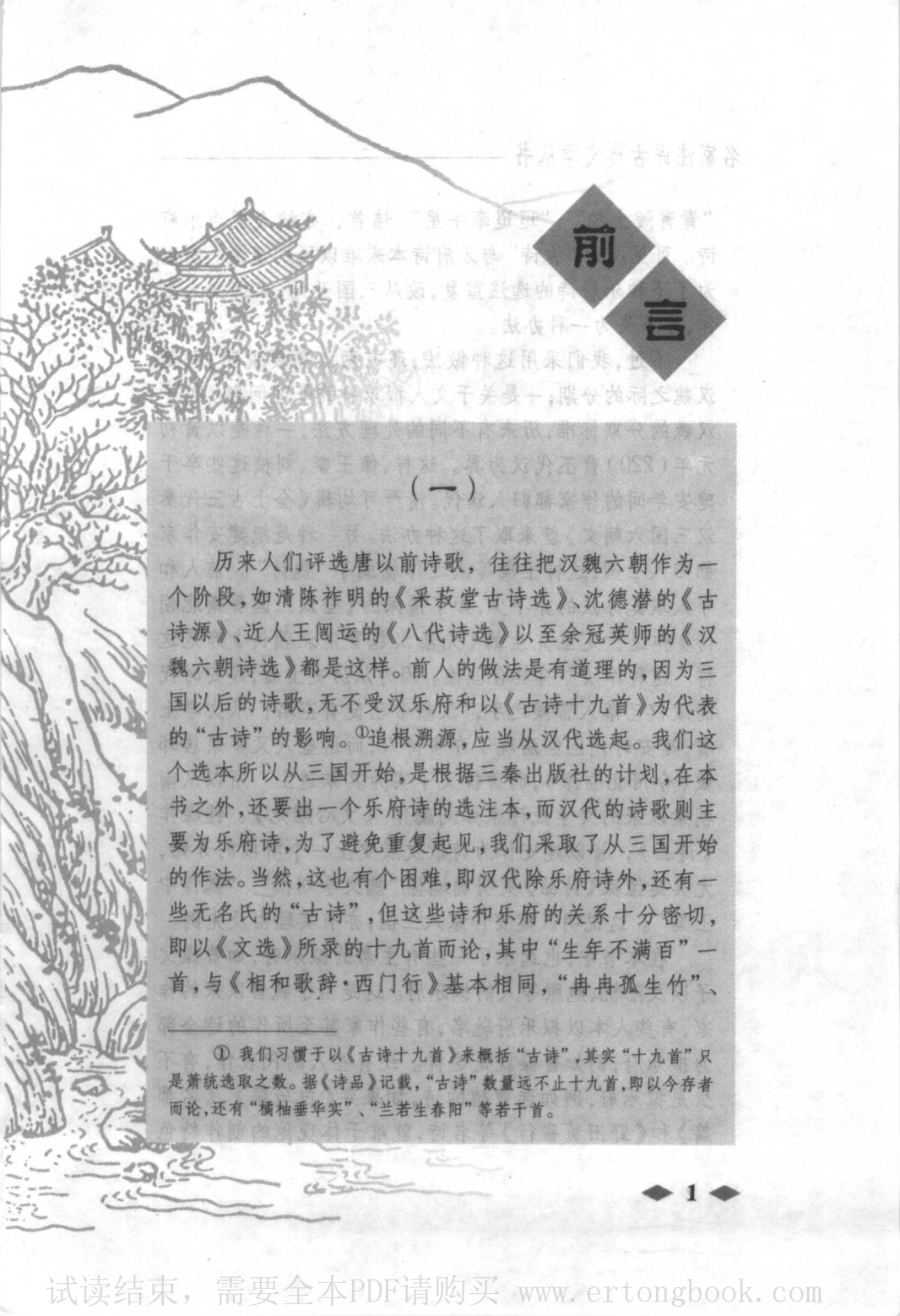
王运熙 王水照 钱仲联 袁行霈

郭预衡 曹道衡 傅璇琮 褚斌杰

编辑工作委员会：

傅璇琮 王水照 陶文鹏 魏全瑞

薛瑞生 阎琦 淡懿诚



前言

(一)

历来人们评选唐以前诗歌，往往把汉魏六朝作为一个阶段，如清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近人王闿运的《八代诗选》以至余冠英师的《汉魏六朝诗选》都是这样。前人的做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三国以后的诗歌，无不受汉乐府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的影响。^①追根溯源，应当从汉代选起。我们这个选本所以从三国开始，是根据三秦出版社的计划，在本书之外，还要出一个乐府诗的选注本，而汉代的诗歌则主要为乐府诗，为了避免重复起见，我们采取了从三国开始的作法。当然，这也有个困难，即汉代除乐府诗外，还有一些无名氏的“古诗”，但这些诗和乐府的关系十分密切，即以《文选》所录的十九首而论，其中“生年不满百”一首，与《相和歌辞·西门行》基本相同，“冉冉孤生竹”、

^① 我们习惯于以《古诗十九首》来概括“古诗”，其实“十九首”只是萧统选取之数。据《诗品》记载，“古诗”数量远不止十九首，即以今存者而论，还有“橘柚垂华实”、“兰若生春阳”等若干首。

“青青陵上柏”、“迢迢牵牛星”诸首，亦被人视为乐府诗。可见所谓“古诗”与乐府诗本来难以区别清楚。所以为了不和乐府诗的选注重复，改从三国开始，只选文人之作，亦不失为一种办法。

不过，我们采用这种做法，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汉魏之际的分期；一是关于文人拟乐府的处理问题。关于汉魏的分期标准，历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以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汉为界。这样，像王粲、刘桢这些卒于建安年间的作家都归入汉代。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就采取了这种办法。另一种是把建安作家都归入三国，这样王粲等人之作就成了“魏诗”。前人和今人取此办法的亦不少，如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逯钦定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都是这样。这种作法亦有其合理性。因为从历史上看，建安时代的政权已落入曹操之手，汉献帝已徒有空名；从文学上看，建安时代已经涌现了许多诗人，而这些人又多聚居邺城（今河北临漳），而曹操父子实为其东道主。所以从南朝梁以来的文学批评家如刘勰作《文心雕龙》、锺嵘作《诗品》，皆以建安作为诗歌发展史上一个阶段的开始，尤其是锺嵘《诗品》更明确地称“魏文学刘桢”、“魏侍中王粲”。这说明以建安作家入三国，亦有其理由及先例。

在本书中，也选录了一些有主名的拟乐府，如曹操父子以及陆机、鲍照等人的拟乐府。这是由于魏晋以来的作家，有些人本以拟乐府驰名，有些作家甚至所作的诗全部为拟乐府，例如曹操就是这样。还有些人的代表作，有不少是拟乐府，例如选曹植的诗，如果弃《白马篇》、《名都篇》和《野田黄雀行》等名诗，就难于体现他的创作特色

(其实连《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本亦可入乐府之列)。选鲍照的诗,如果不取《拟行路难》和《代东武行》、《代出自蓟北门行》也是这样。其他如陆机的拟乐府,也在他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亦难全部弃而不录。不过魏晋以后文人所作的拟乐府,有很大一部分并不谱曲歌唱。《文心雕龙·乐府》:“子建(曹植)、士衡(陆机),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大抵自东晋南朝以后,许多文人所作的拟乐府,其写作目的本来是模拟前人同题之作或借用乐府的旧题,和其他诗歌并无区别。他们在写作时,并不考虑谱曲歌唱的问题,其作品在当时是否能合于这些曲调的声律要求,也是可以怀疑的。因此把它们当作一般诗歌来选录,似无不可。

(二)

本书所录的三国诗,实际上全属魏诗,这是由于当时曹操父子对文学的爱好与提倡,使文人们聚集于邺城等地之故。当时吴蜀二国也不是没有人作诗,但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说均不及魏诗,所以各种选本亦很少选录。我们考虑到多数读者的需要,本书亦未采录。

在这里所说的“三国诗”或“魏诗”,如果从建安元年(196)到晋武帝代魏(265)总共七十年。在这七十年中,诗歌方面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大抵建安作家的诗歌,都深受汉乐府的影响而又加以变化。例如曹操,据《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说他“好音乐,倡优在侧,常日以达夕”;同书又引《魏书》说他“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现存的诗歌都是利用乐府旧曲,

另造新辞。像著名的《薤露》、《蒿里》二诗，写汉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严重苦难，被后人评为“汉末实录”、“诗史”；他的《短歌行》、《龟虽寿》等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抱负与气概。这些诗风格质朴，苍凉悲壮，宋教器之曾用“幽燕老将”来形容其诗风。曹操以外，像“建安七子”中年龄较长的陈琳，其代表作《饮马长城窟行》，亦富于民歌色彩，所以清沈德潜说此诗“可与汉乐府竞爽矣”。

曹操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也是建安诗的重要代表人物。曹丕的诗历来以为不如曹植，但他的乐府历来亦有很高评价。《文心雕龙·才略》说曹丕“乐府清越”。今存《燕歌行》尤为有名，可以说是标志着七言诗成熟的杰出代表作。他乐府以外的诗歌亦有名篇，如入选的《杂诗》即其一例。曹丕的诗较之曹操之作其骨力已稍逊色，而辞采却显华丽。所以清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古诗源》卷五）

曹植在建安诗人中，历来最受推崇，现存作品也较多。他的作品可以根据其生活经历分为前后两期。建安年间，曹操健在，他是一个贵公子，虽然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也时刻想建功立业，但当时他涉世尚浅，其《白马篇》诸作主要写自己的一种抱负和向往。至于黄初以后，他的处境不同了。这时他名为藩王，其实几同囚徒，深受曹丕的猜忌，在《赠白马王彪》一诗中充分体现了这种情形。曹丕死后，曹睿继位，对他的猜忌有所减轻，他这时对建功立业又抱有希望，像著名的《杂诗》六首就是显例。不过，他这种愿望并未实现，终于在忧愤中去世。曹植的诗对后世诗人影响极大。鍾嵘《诗品》评曹植诗“骨气奇高，

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从诗的气格刚劲，情调沉雄来说，颇得汉乐府的精髓，而词采的华艳，又驾曹丕而上之。在建安作家中他最受历来论者的推重。

除了曹操父子外，“建安七子”亦颇负盛名。其实“七子”的成就各个不同，其中以诗歌见长的当推王粲和刘桢。王粲曾被人称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七哀》（其一），深刻反映了汉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的诗文辞华美，所以人们常把他和曹植并提。刘桢的诗则以气骨高超著称。对于王粲和刘桢，历来的评价不尽相同。大抵爱好辞采的就推崇王粲，强调气骨的却看重刘桢。后来作家中如晋代潘岳、张协的诗风就近于王粲，左思及南朝的鲍照则较近刘桢。

三国后期的魏国，政权落入司马懿父子之手，曹氏与司马氏的争权斗争颇为剧烈，士人的处境十分艰险。一些正直的士人对政局颇有不满，但又不敢直说，往往采取隐晦曲折的手法来吐露心中的苦闷。这一时期的诗风与建安那种慷慨悲凉之气颇有不同，其代表人物主要是阮籍和嵇康，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特色在于含蓄深沉，所以钟嵘说这些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不过我们今天读他的诗，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忧生之嗟。他的诗风对后来诗人亦有极深影响，如南朝江淹的《效阮公体》、唐代陈子昂的《感遇》就深受其影响。嵇康与阮籍齐名，他的诗以四言见称，如最有名的《赠秀才入军》中有许多传诵的名句像“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等，常为人们引用。前人论先秦以后的四言诗，认为能者甚少，只有曹操、嵇康和陶渊明最有特色。

晋武帝代魏灭吴，使全国又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统一

局面,但这局面又很快消失,再度陷入“八王”、“五胡”之乱,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势。

西晋皇朝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出现的诗人却不少。其中年辈最长的要数傅玄和张华,稍后则有潘岳、陆机、左思、张协诸人。傅玄之作多为乐府,诗风较质朴,受汉乐府影响很深。他的诗较多地写到妇女的痛苦。张华是一位政治家,锺嵘说他的诗“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又说“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潘、陆、左、张四人,可以说是“太康(晋武帝年号)诗人”的代表。这四位诗人的风格有很大差别,潘岳的代表作是《悼亡诗》,诗风华美哀婉,历来传诵。陆机诗最为繁富,辞藻绚丽,讲求对仗,用典较多。前人对潘、陆的评价颇有不同,东晋的李充认为潘诗不如陆诗之深,而谢混则认为陆诗不如潘诗之净,其实二人各有所长,不必分什么高下。左思的诗与潘、陆又有更大区别,他的《咏史》最为传诵,诗风清刚,以骨力取胜。锺嵘《诗品》对他的评价似稍逊于陆机,然而宋严羽《沧浪诗话》则对陆机评价远不如左思。现在看来,宋人之贬陆机大约是不满他的过于繁富,相比之下,今天多数读者似更爱读左思之作。不过陆机对南朝作家的影响也不应忽视。例如颜延之的诗风,就以陆机为圭臬。张协的诗和潘陆左三家又不相同,锺嵘说他的诗出于王粲,“文体华净,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他的《杂诗》历来为人传诵。他的写景手法对后来的山水诗和田园诗都有很大启发。西晋乱亡时,张华、潘岳和陆机先后被杀;左思、张协都隐退了,从此再无创作传世。所以《文心雕龙·时序》称晋时“运涉季世,人未尽才”。

西晋后期的诗歌由于受魏晋玄谈的影响,往往有较

浓厚的老庄思想成分。此风一直延续到东晋末才有所转变。因此,从西晋末到东晋,大量出现的是“淡乎寡味”的“玄言诗”。这种诗虽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毕竟很少人爱读。所以这个时期里最杰出的诗人当推西晋末的刘琨、东晋初的郭璞和东晋末的陶渊明。刘琨是西晋末年在北方坚持抵抗前赵和后赵的英雄,由于势孤力单,再加上后来为鲜卑人段匹磾所囚,有志未酬,所以诗风清刚,颇有悽戾之词,金代诗人元好问颇推崇其诗,认为足与建安的曹植、刘桢媲美。郭璞则是从北方流亡到江南的诗人,他的诗以《游仙》为最著。这类诗现存者凡十四首,但人们所常读的仅萧统《文选》所录的七首。鍾嶸《诗品》说他的诗“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又说这些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的确,郭璞身处东晋初年朝廷孤弱,军阀王敦跋扈之际,因此忧患之心很深,与前代一些人的游仙之作很不一样。这也许正是他的作品超出前代游仙诗的主要原因。

东晋一代诗人成就较高的很少,但末年却出现了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的人格在当时已颇受人推崇,但他的文学成就,直到南朝齐梁时代,还不太为人们所重视。这大约和他的诗风与当时其他作家有显著不同有关。陶诗最大的特色是平易自然,全无半点斧凿痕而愈显真切。这和当时“偏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诗风完全不同。袁行霈先生说:“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册第79页)陶渊明的诗甚多,我们在这里仅仅选录了最为人们所传诵的几首,其他如《桃花源诗》表现了他幻

想一个“秋熟靡王税”的乌托邦；《形影神诗》表现了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生死观，在当时更显突出。陶渊明的诗历唐迄宋愈来愈受人称道。唐代诗人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无不深受其影响。宋代黄庭坚认为陶渊明所以胜过谢灵运、庾信诸人，正在其直抒胸臆，不计较别人“赞毁其工拙”。这看法是有见地的。

差不多和陶渊明同时，诗坛上发生了“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变化。首开此风的是谢混，但他的诗作不多，故得名未盛。真正能代表山水诗的是他的侄儿谢灵运。谢灵运作为东晋名臣谢玄之孙，在刘裕代晋建宋之后，自以为“才能宜参权要”，而朝廷只把他看做一个文人，未加重用。他就纵情山水，到处游览，写了许多模山范水之作。他的诗熔情、景、理于一炉，锤炼之功不遗余力，而写成诗句以后，又往往反而显得自然。他最为传诵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自以为得于神助。后代许多山水诗几乎无不受谢灵运的影响。和谢灵运齐名的颜延之，其创作可谓步趋陆机，因用典过多而被人讥为雕绘满眼。但他的《五君咏》似较少此弊，所以历来被视为名篇。

稍后于颜、谢的鲍照以善写拟乐府著称，他的诗风奇险道劲，骨力直追建安，而自然活泼足与谢灵运颇颇。尤其是他的七言乐府，更为唐代的李、杜、韩、孟等人所取法。尤其像《拟行路难》诸篇，更是历来传诵的名作。他乐府以外的诗则亦自成一体，有的以生涩见长，如本书所选的《发后渚》即其一例。有的则是以华美的辞采和工整的对仗取胜，如《上浔阳还都道中作》。杜甫评他的诗风为“俊逸”，其显例即《文选》所录《玩月城西门廨中》一诗的“归华先委露，别叶早辞风”之句（本书未录）。这类诗

已开齐梁诗人谢朓等人的先河。

鲍照卒于宋明帝初,在他死后不久,就到了宋齐易代之时。齐代时间甚短,所以此后一些作家如江淹、沈约都经历了宋齐梁三朝。江淹的诗受鲍照影响最为明显,此外他有些诗亦取法阮籍。钟嵘说他“诗体总杂,善于模拟”,这大约是着眼于他的《杂体诗三十首》(本书录其中三首)而言。沈约年龄比江淹稍长,但其成名却要晚些。他和齐代诗人谢朓同为“永明体”的创始人。所谓“永明体”是以讲求声律为特色,为后来的律诗奠定了基础。大体所谓“四声”之分及关于诗句声律的要求,主要是沈约提出的;但在创作方面的成就则不如谢朓。谢朓之诗“奇章秀句,往往警道”(钟嵘《诗品》),他对唐代的李白、王维、孟浩然等都有很大影响。人们论李白说他一生低首谢宣城;也有人认为谢朓的诗开了唐音的先声。这些评价都很中肯。谢诗名句极多,如“大江流日夜”、“澄江净如练”,一直为千古所传诵。

南朝梁陈二代诗人如何逊和阴铿,也都各有佳句,他们的诗在形式上更接近律诗,在艺术手法上亦多取法谢朓而各有其创造。杜甫的诗就多化用何逊诗句,并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梁陈间还出现了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这个诗派的作品以描写妇女生活及她们的体态为特色,历来的论者对这些诗常取否定态度,现在看来,这些诗的内容确实较少可取,但在艺术技巧上还是有其贡献。我们认为这类作品在文学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但像本书这样带普及性的选本,似乎不一定要选录。书中采录了徐陵的《关山月》一诗,其诗风与萧纲某些作品比较接近。徐陵早年与萧纲关系密切,他所编选的

《玉台新咏》，据说就是奉萧纲之命而作。

相对来说，北朝的诗歌不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均不及南朝。这是因为北方经历了长期战乱，很少有人安心创作之故。从文学史的研究来说，北朝诗人的出现似可追溯到北魏中期的郑道昭甚至前期的高允，但那些人的诗在艺术上还很不成熟，所以本书只能像历来的选本一样，从北魏末年的温子升选起。无可否认的是出生于北方的温子升、邢邵和魏收三人的诗，可选者亦甚少。历来认为北朝文学的杰出代表要数庾信。不过，庾信本是南朝诗人，梁末出使西魏，刚到长安，西魏军已攻陷江陵，俘杀梁元帝萧绎，于是他只好长期留在北方。这就使他既感到屈辱，又有怀念江南的思乡之情。庾信在出使以前，诗才早已成熟，并和徐陵合称“徐、庾”。在诗风方面以“绮艳”、“清新”为特色，与当时流行的宫体诗比较相近。他到了北方以后，由于身经多次战乱，又遭遇流亡及背井离乡之苦，因此显得苍老悲凉，自成特色。在他现存作品中成就较高的多为晚年之作，所以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之语。在庾信身上我们更可以看出生活经历对作家创作成就的决定作用。和庾信情况比较类似的还有王褒，不过其成就不像庾信那样突出而已。

(三)

本书编选的目的是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新的魏晋南北朝诗选本。这个选本既不宜篇幅过大，也不宜过小，力求尽量收入这一时期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使读者对这一时期的诗歌面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且从中了解

到魏晋南北朝诗的历史地位及其为唐诗的繁荣所起的准备作用。为了便于普及起见,一些过于艰深的诗篇和某些思想倾向不很健康的作品都未入选,同时为便于读者了解诗意,我们作了一些简明的注解和点评。在注解方面,我们考虑到读者的需要,一般很少引证前人的原文,以求通俗易懂。在点评方面,我们参考了不少前人的意见,有时也略述自己的看法,是否正确,不敢自以为是。

本书在编注过程中,王晓东、施建军二同志做了不少工作。此书的选题是蒙三秦出版社诸先生之约,其出版蒙他们大力支持,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曹道衡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目

录

曹 操

✓ 蒿里行 (1)

✓ 短歌行(对酒当歌) (3)

步出夏门行 观沧海 (5)

龟虽寿 (7)

曹 丕

✓ 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 (9)

杂 诗(西北有浮云) (11)

曹 植

送应氏(二首) (13)

(步登北邙阪) (13)

(清时难屡得) (15)

弃妇诗 (16)

赠丁仪王粲 (18)

赠徐幹 (20)

✓ 赠白马王彪(并序) (23)

杂诗三首 (28)

(高台多悲风) (28)

(南国有佳人)	(29)
(仆夫早严驾)	(30)
名都篇	(31)
✓白马篇	(34)
野田黄雀行	(36)
吁嗟篇	(37)
七哀	(39)
蝦鯨篇	(41)

陈琳

饮马长城窟行	(44)
--------------	------

王粲

七哀诗(二首)	(47)
✓(西京乱无象)	(47)
(荆蛮非我乡)	(49)

阮瑀

驾出北郭门行	(51)
--------------	------

徐幹

室思(六首)	(53)
(沉阴结愁忧)	(53)
(峨峨高山首)	(53)
(浮云何洋洋)	(54)
(惨惨时节尽)	(54)
(思君见巾栉)	(54)